

“只知有莫，不知有英”^①的大话。像唐廷枢、徐润、郑观应、莫仕扬等在洋行或通商口岸做买办的人，在近代香山县为数众多。19世纪50年代后，香山人利用血缘和地缘的关系，彼此牵引，互相提携，纷纷迁移到上海、天津、汉口等通商口岸城市，成为洋商在通商口岸最出色也最信赖的买办商人。尤其是刚刚开埠通商的上海，香山人几乎在与外贸和商业经营有关的如洋行、商号、钱庄等领域占据了有利的地位。而上海的宝顺、怡和、琼记、太古等洋行的买办，主要是香山人。时人就有这样的记述：“几乎所有的外商雇佣的买办都是（香山）这个县的人，这些人介绍的雇员自然都来自他们的家乡。”^②在整个19世纪，香山人几乎与“买办”同义，香山县也常被人们称为“买办的故乡。”香山人以地缘、血缘关系为纽带，在洋人的庇护下，依靠政府的力量，从事着买办和商业经营活动，在近代中外贸易、洋务运动，甚至晚清政治和思想文化建设中，成为事实上的先驱者和创造者。一方面，他们是洋行买办或买办商人，是中外商贸过程中的中介人和实践者，有力地推动了中外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同外商的密切接触，认识到新式企业的重要性，因此在当时任何其他阶层的人形成同样的意图之前，就已经投资新式企业，并积极身体力行地推进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改革，在近代中国中西文化交汇中成为真正经济上的富有者、政治上的改革者、思想文化上的引领者。

二、香山买办文化的构成

买办和买办阶级的出现是近代中国社会的特征，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并非中国所独有，在其他落后的半殖民化的国家也曾发生过，如日本最初与西方国家通商时，就有类似中国买办性质的商馆番头（banto），东印度公司入侵印度时期，也有被称为巴尼（banian）的买办资本家。^③

^① 徐矛主编：《中国十买办》，第356—358页，唐有淦：《从洋行买办到民族资本家》，珠海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香洲区政协文史委员会1995年版编印，第125—132页；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珠海人物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② [美] 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第215页。

^③ 李燕编著：《买办文化》，第13页。

但是，日本和印度等国的买办和买办资本并没有进一步向政治和文化等领域扩张，且随着国家主权的确立和自由贸易的发展而消失。近代中国的买办却经历了两次大的历史性跨越：即从个体的职业买办到买办阶级，又从买办阶级演变成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买办和买办阶级的发展历程中，买办职能的增加和买办性质的变化，以及买办活动范围的扩大，使“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和文化历史形态形成了，那就是买办文化”。^①这种在社会发生变化时期，滋生于旧文化与新文化之间的带有间性特征的文化形式——买办文化，无论是其内容构成，还是其表现形式和基本特征，都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价值体系和文化内涵。尤其是以唐廷枢、徐润、郑观应为代表的香山买办，在19世纪的中国社会大变动时期，以一种积极主动和开放进取的姿态，在为洋行提供各种有效的服务的同时，还关注中国社会自身的前途和命运，并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中国近代早期工业化和公益事业的建设之中，在工商业、公益事业、文化教育、政治外交等方面，均有不少积极进步的表现，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香山买办文化现象。

从内容构成上看，香山买办文化有其语言的、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内涵，是香山买办在语言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各种层次的活动成果及其创造物的总和。

首先，香山买办在语言文化方面的吸收与创造，形成了富有中国语言特色的

^① 李燕编著：《买办文化》，第15页。

“广东英语”。在从“广东英语”到“洋泾浜英语”转变的过程中，^①香山买办起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目前我们尚不能确切地了解“广东英语”的首创者，但可以肯定的是，以香山买办为主体的广东买办较早地掌握、运用和传播了这种独特的英语。美国人威廉·C·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中曾有这样的记述：“‘广东英语’这个名词，是专指在广州的中国人与‘西洋人’之间用作进行商业交易和往来媒介的独特语言。”“‘广东英语’是广州口岸在早期对外交往中产生的。这种奇特的语言的产生是很自然的。外国人来广州的时间短暂，他们不愿意或不能够致力于学习像中文这样一种难学的语言，甚至要学讲一些极普通的话也不容易做到，即使学会了，到其他地方也毫无用处。加上当地政府严厉禁止学习它，甚至将一个讲授中文的中国教师斩首。”“另一方面，伶俐的中国人，却巧妙

^① 大约在16世纪末至18世纪中叶，广州口岸的中国人与西方人商业交往的语言是“广东葡语”(Pidgin-portuguos)，18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英国在中西贸易中地位的上升，“广东英语”代替了“广东葡语”。到19世纪中叶，五口通商后，广东英语盛行于上海外国商馆集中的洋泾浜，同时也加入了一些上海方言，于是形成了与“广东英语”同中有异的“洋泾浜英语”。薛理勇在《上海闲话》中对洋泾浜英语的产生、形成和演变有更详细的介绍，他认为：洋泾浜英语是一种特殊的区域性语言和文字，因广泛流传在上海的“洋泾浜”地区而得名。该语言以汉语为母体，并主要掺杂英语，或以英语为母体，掺杂大量汉语，故多被讲作“洋泾浜英语”。17世纪后英国大规模向海外扩张，在许多地区建立殖民统治。许多英国势力强大的港口城市，在与英国的贸易中形成和产生了一种英语和该国语言混合使用的“皮钦语”(pidgin)。早在清乾隆年间，中国的广州在对英贸易中已产生这种语言。因pidgin与pigeon(鸽子)的发音一样，于是“皮钦语”也被叫做“鸽子语”或“鸽子英语”。上海开埠后，随着中英贸易的发展和上海侨民人口的增长，在上海的“洋泾浜”地区又形成和产生了以沪语为母体，掺杂大量英语的语言，遂被叫做“洋泾浜语”或“洋泾浜英语”。外国商人为要与中国人打交道，必须学习使用汉语或上海话。中国商人要与洋行做生意，也必须学习使用英语。有些书商就设计印刷了类似现在的“简明英语会话手册”小册子，并以汉字的读音来注英文读音。由于中国地域辽阔，方言众多，所以所谓汉字注音实际上是方言注音，于是“洋泾浜英语”中还混杂了各地的方言。如清末有一位宁波人编印了一本《洋泾浜英语实用手册》，他是这样注音的：

“来”叫“克姆”(come)“去”叫“谷”(go)
“一元洋钿”“温得拉”(one dollar)
“廿四铜钿”“吞的福”(twenty four)
“是”讲“也司”(yes)“勿”讲“拿”(no)
“翘梯桡梯”“喝杯茶”(have tea)
“雪堂雪堂”“请依坐”(sit down)
“如此如此”“沙咸鱼沙”(so and so)
“自家兄弟”“勃拉茶”(brother)
“爷”要“泼茶”(father)“娘”“卖茶”(mother)
“丈人阿伯”“泼茶佬”(father law)

通过书籍的传播，有些注音的汉字也在“洋泾浜英语”中替代英文使用，如旧日上海把“24”写作“吞得福”。20世纪后，随着大批出国的留学生返回上海和上海开设的外语学校增加，上海人的外语水平提高，“洋泾浜英语”的使用稍有减少(薛理勇：《上海闲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08—209页)。但在20世纪描写都市生活的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里，仍然有“洋泾浜英语”的痕迹。说明洋泾浜英语在中国沿海通商口岸城市社会中曾产生过较深远的影响。

地运用听惯的外国音调，成功地弥补他自己语言的不足，并依照他自己的单音节的表达方式，同时使用最简单的中国话来表达他们的意思。他们就这样创造出一种语言，可以说是没有句法，也没有逻辑联系的语言，只将其化为最简单的成分。但它却很牢固地扎下了根，成了许多数额巨大的生意或极为重要的事情的事的便利的交际媒介，以其活力和奇特性一直流行到今天。”“这无疑是中国人的—种发明，在英国人出现在广州很久之前，已有它的根源。这可以在其中找到一些葡萄牙语和印度语的混合来证明，后者的来源可能是由那些最初经过印度的西方来客传来的。英国人在一百多年以后才到来，他们语言中的一些词汇逐渐被吸收进去，增加到使葡萄牙语消失，葡语便只限在他们的殖民地澳门使用。后来英国最终成了最主要的贸易者，这种语言便成了著名的‘广东英语’。”^①

鸦片战争后，伴随着中外贸易的繁荣，外语人才日益成为制约商贸发展的瓶颈之一。广东商人凭借自己熟谙英语的特长，在鸦片战争后的沿海对外贸易领域独领风骚。他们要么充当洋行的买办，要么成为通事或译员，要么成为独立的商人，从事



唐廷枢编撰的《英语集全》

着中外贸易。上海开埠初期的怡和、旗昌、琼记等洋行的买办，大都来自广东。徐润的伯父徐钰亭，于鸦片战争前曾在“半通夷语”的澳门经商，凭着他与宝顺洋行大班必理的交往，当上了上海宝顺洋行的第一任买办。^②

尽管能操“广东英语”的粤籍买办受到江、浙、闽各地商人的青睐，也深受洋行的重用，但是，带有浓厚粤语方言的“广东英语”，很难为多数江、浙、闽等地商人所理解，即使是粤籍商人，理解起来也有一定的困难。有鉴于此，曾受过

^① [美] 威廉·C·亨特著，冯树铁译：《广州“番鬼”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45页。作者在这里所说的澳门为葡萄牙的殖民地，其实并不准确，也不合乎历史事实。以下引用此书时还存在这种现象。

^② 汪敬虞：《唐廷枢研究》，第30—31页。

良好英语训练、能写一手漂亮英文和讲一口流利的纯正英语的唐廷枢，决心根据自己学习英语的经验，结合粤语发音的特点，在前人著述基础上自编一部更加适用的英语读本。其目的在于帮助同胞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尤其是英语的会话和写作。在唐廷枢看来，要与英美各国的商人、教士等打交道，若不了解他的语言文字，就会受其蒙蔽或欺诈。在中外交往中，只有知己知彼，才能遇事胸有成竹，利权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他在自序中写道：“因睹诸友不通英语，吃亏者有之，受人欺瞒者有之；或因不晓英语，受人凌辱者有之，故复将此书校正。”强调英语学习之重要，认为来华外国人中“贸易最大莫如英美两国，而别国人到来亦无一不晓英语，是与外国人交易，总以英语通行。粤东通商有百余载，中国人与外国交易者，无如广东最多，是以此书系照广东省城字音较准。”^①他编写的这部《英语集全》上距被称为中国人编写的最早的英语词典——《红毛蕃语》虽然不到30年的光景，但他的编著作用和影响却是毋庸置疑的。19世纪80年代以前，国人所编的英语词汇及会话集虽然有多种版本，但是，以线装木刻本的传统方式出版，而且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还是包括《英语集全》在内的《英语注释》、《英字入门》与《英字指南》四种。此书较以前出版的英语学习指导篇幅更大，有六卷之多。从序言中可知，该书原名《华英音释》，后又改为《英语集全》，此书有英文序，有详细“切字论”与“读法”说明，比以前的《华英通语》和《英语注解》又进步不少。张玉堂在序言中对此书亦大加肯定，称赞该书“分门别类，订谬指讹，莫不条分缕晰，至吹唇音、卷舌音……尤发前人所未发，诚为习英语者之津梁也。”^②吴湘在序言中更进一步指出，该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学习一种对商贸有利的语言，而且还有利于人们了解时务和开阔眼界。^③格致书院的学生在课艺答题中亦认为该书“共分六卷，各种要字，俱载于卷首，又择其尤要者，于每卷之首列明，以便查验。且英国语言，中国无字相肖者甚多。故此书所音各字，恒用切法，以期吻合。于粤音无字可切者……计七十余字，皆用官音为底切音，便能吻合。广东番语，亦有不同。……此书皆辨别详明，读者苟审定其音，粤音固能

① 《英语集全·唐廷枢自序》，转引郭秀文编著：《清代广州与西洋文明》，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132页。

② 《英语集全·张玉堂序言》，转引郭秀文编著：《清代广州与西洋文明》，第132—135页。

③ 《英语集全·吴湘序言》，转引郭秀文编著：《清代广州与西洋文明》，第135页。

无误，即官音也未尝不可通也。”^①可见该书在当时外语学习的读本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今人在比较研读当时包括《英语集全》在内的英语读本后，更认为“该书的编写和刊刻是中国近代英语教学史和中国近代外语出版史上的大事，它打破了比较正式的实用性的英语读本由外国学者编刊的局面，从而揭开了晚清以后更大范围，持续时间更长的接连不断的中国人参与英语读本编译和出版的历史。”^②尽管“广东英语”和后来进一步发展并广泛使用的“洋泾浜英语”不是香山买办首创，但以唐廷枢为首的香山买办在“广东英语”发展到“洋泾浜英语”的过程中，无疑起了示范带头的推动作用。语言是一种文化，是一个时代历史与文化变化的缩影。由广东商人特别是香山买办在中外商贸活动中使用的一种商业英语，即“广东英语”，是“中体西用”和文化交融的重要成果。从以唐廷枢为代表的香山买办的语言学习、语言创造和语言传播的活动中，我们不难看到隐藏在“广东英语”或“洋泾浜英语”背后的文化力量。

香山买办在规范、运用和传播“广东英语”或“洋泾浜英语”的过程中，同时还不断地在物质文化创造方面有所作为。有的学者就指出：“买办积累的巨额财富，除部分用于商业应酬，备极富丽的居住条件和奢侈生活外，有相当部分投资于近代工商企业等活动。它涉及商业、金融、航运、工矿、房地产等许多领域，且在外商企业亦有大量附股活动，范围甚广。”^③

香山买办的物质文化创造，主要包括各种形式的工商企业活动，



徐氏未园（绘画）

① 《格致书院课艺》，中国图书集成印书局 1898 年版。

② 郭秀文编著：《清代广州与西洋文明》，第 163 页。

③ 黄逸平：《近代中国的经济变迁》，第 150 页。

如在航运、保险、铁路、码头、银行、地产、矿业和工商企业等方面的附股或投资，以及在衣、食、住、行、用等方面的创造性和探索性的行为。如唐廷枢、徐润、郑观应三人先后在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平矿务局等近代工商企业中担任重要职务，并开展了一系列生产和经营活动，其工作成就应该是香山买办文化的物质文化表现。香山买办在日常生活方面的创造和追求，也同样打下了买办文化的烙印，富于浓郁的香山文化特色。居住方面，如徐润、郑观应、莫仕扬、唐廷枢等香山买办的住宅，建筑就颇有中西合璧的风格，“最早的洋房，便是黄浦江外滩，靠陆地一边，面积约二三英亩的场地上的一所大宅院，其中仓库和住房集合在一起。没有外国建筑师可供利用；图样由外国侨商自行绘制，又为适合就地取材和中国技术而由中国营造商加以修改，因而这样起造的房屋结构，图样极为单纯。……为了挡住阳光，尽可能保持室内的阴凉，泥塑或本地砖砌的墙壁至少有三英尺厚，外面粉刷得雪白，底下两层楼外面周围是配置着大拱门的敞开游廊，挑出的屋檐掩盖着顶上的两层或三层。场地后面，通常有四五个仓库，中国籍助理人员的寓所，买办的住宅和办公室，还有若干马棚。过了几年，砖头开始从英国装载轮船运到上海，在面向外滩的游廊拱门上突出地展示的砖砌工事，正提供了为外国货换取中国的大量茶丝而探索中国市场的一种象征。这种为19世纪华中和华南的一切通商口岸所共有的建筑风格，被机智而适当到称作‘康百拉都式’(Compradoric)，因为它必然是营造方法上的中西合璧。”^①香山买办徐润的生活十分奢华，^②住宅设备富丽堂皇，比当时英国皇室贵族毫不逊色。1905年一位西方女记者对徐润住宅的评述就是“入其室若别有天地，恍惚在梦之中，经过通屋看过，房间如此之多且大，自己亦不知在屋内何处”，“与所闻东方人家大相悬殊。”^③而莫仕扬家族在家乡会同村的住宅建筑，则具有岭南乡村建筑的文化意蕴，表现了香山买办在文化价值取向上的本土特色，也说明香山买办文化实际上是中西文化相互融合、相互补充的产物。与此同时，买办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

① [美]罗兹·墨非：《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页。

② 徐润回香山完婚时，“上海各帮朋友亲戚送衣帽袍料不计其数，所收礼洋多至一千六七百元”，而当时上海一个中等人家的月收入仅10元左右。徐润完婚返回上海后，大肆铺张，“酬谢之酒历四五天，每日在桂花楼设四五十席，可谓一时之盛。”

③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版。

方式的西化倾向，在当时中国保守的社会里也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尽管有的人喜欢中式服装，穿“蓝绸长袍和剃过的头上戴一顶绷得紧紧的瓜皮帽”，但买办毕竟是最早的西装革履的中国人。香山买办如徐润、唐廷枢、郑观应等平时就是典型的中式服装，其日常生活却是中西合璧或不中不西，既时尚又古朴，别具匠心地将中西物质文化很好地糅合在一起，形成了所谓的买办式风格。

早期买办的活动，严格说来，主要在经济方面。他们和在华企业的外国资本家之间存在着一种奇特的关系，既是雇用的，又是相对独立的。他们根据契约规定，实现彼此之间的权利义务。但香山买办在19世纪70年代后就积极响应清政府的号召，投身于新式工业的创建和经营管理工作，并在这些新式企业的草创阶段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和极大的热情。他们不仅为中国早期工业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为完成中国工业经济的原始积累奠定了基础。他们在工商业上的成就和所获得的名利，都为当时的中国人进入新式工商业的领域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香山买办在物质文化创造方面的表现，还在于他们依托洋行的庇护或授予的特权，独立地经营自己的生意。香山买办最初主要是经营茶叶和生丝，以及鸦片等。唐廷枢在担任怡和买办的10年里（1863—1872年），除了为怡和经理库款、收购丝茶、开展航运以及在上海以外的通商口岸扩大洋行业务，还为他的老板投资当铺，经营地产，运销大米、食盐，开采矿产。与此同时，他又与同乡前任买办林钦合伙开设茶栈，经营丝、茶等方面的生意，与徐润一起合股开设仁和、济和保险公司，开创了中国人自办保险公司的先河。徐润在宝顺洋行任买办时，就开设茶栈和绍祥商号，经营生丝、茶叶等生意。19世纪70年代，徐润又投资房地产业。到1884年徐润在房地产上投入的资本已达200多万两银子，从而拥有地产3000多亩，其中300多亩已建洋房50多所，其他类型房2000多间，每年可收租银12万余两。他先后和华商、外商合作创办了上海地丰公司等五家房产开发公司，成为名副其实的“地产大王”。另外，徐润还在推动中国文化事业走向近代化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诸如参与创办格致书院、仁济医院、中国红十字会等等，其中影响深远的是参与并负责选派幼童赴美留学和创办同文书局。^①

香山买办在19世纪的中国各种经济社会活动中，既是“工商立国”的倡导

^① 张耀中主编：《珠海历史名人》首卷，珠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51—52页。



部分留美学生在天津海关道台衙门前的合影

者，又是实践者。他们强调“兵战不如商战”，主张发展工商业，并积极主动地响应政府的号召，放弃优厚待遇，将买办收入和经商所得的资金投入到新式企业之中，有效地弥补了清政府创办新式工商企业时资金不足的缺陷，并率先在生产经营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尝试中西、古今的结合，实现了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中国物质文化的创造与融合，在当时可谓敢为天下先。

香山买办文化还表现在制度创建和管理上的“西体中用”。买办本身就是构成买办制度和买办阶级的主体部分。买办与洋行或外国资本家的关系是契约关系，既是雇佣的又是相对独立的。买办在外商企业中的权利与义务，均有契约的或合同的规定。买办合同由中外两种文字构成，这在近代中外关系中也是一种新型的劳资关系。由买办合同关系发展为一种买办制度，使买办具有双重身份。买办制度是近代中国条约制度下出现的独特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在买办制度控制下，香山买办成功地实现了职能转变和价值实现。最突出的表现是，香山买办依靠洋行和封建官僚的庇护和支持，将西方先进的管理方式和经营理念，成功地运用到

中国新式企业的生产和管理之中，创造了适合于中国新式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管理制度和生产方式。如以唐廷枢、徐润、郑观应为代表的香山买办，将西方的股份制、保险机制、竞争机制、核算机制纳入洋务企业的管理之中，主张企业商办，提倡民主管理，引进外国科学技术和培养实用人才、实行多元化经营战略，为近代中国企业的发展积累了经验，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模式。^①唐廷枢、徐润、郑观应，都是富有经营新式企业经验的精明强干的人才，他们对于企业的筹备、工程的设计、设备的引进、企业的经营，都能够基本做到按西方资本主义管理方式行事。如唐廷枢在1877年拟定的《开平矿务局章程》中就说：“查此局虽系官督商办，究竟煤炭仍由商人销售，似宜仍照买办常规，俾易遵守。所有各厂司事，必须于商股中选充，方能有裨于事。请免添派委员，并除去文案书差名目，以节靡费。其进出煤钱银钱数目，每日有流水簿，每月有小结，每年有总结，随时可以查核。即领官本，应请亦以年结送核，免其造册不报销，以省文牍。”他提出企业须遵守资本主义的“买卖常规”，主张由懂业务的商人来管理企业各个部门，强调经济核算等等，这些思想都曾受到李鸿章的赞扬，成为洋务派官僚在“求富”、创办民用企业的过程中愿意吸收的观点。^②

难能可贵的是，香山买办在经营和管理新式企业的同时，还大声疾呼政治改



1878年由唐廷枢主持制定的《开平矿务招商章程》

1878年由唐廷枢主持制定的《开平矿务招商章程》

^① 汤照连主编：《轮船招商局与中国近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美]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

^② 马伯煌：《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90页。

革，主张中国实行君民共主的立宪制，要求清政府重视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管理经验，实行有效的政治改良和社会改革。郑观应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他在《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中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改革方案，指出中国必须在政治、经济、洋务三个关键性的领域赶上西方，才可以民富



当时出版的《盛世危言》

国强，长治久安。^①如郑观应在《论游历》中，针对君主了解民情能力和途径上的缺陷，提出两方面的对策：一是仿照西方国家的具体措施，重视完善君主的早期教育，并恢复传统的出巡游历制度，使君主有更多直接了解民情及社会问题的机会；二是要从国家政治制度上着手设立议院，同时还主张用法律手段解决外交问题，利用国际法来争取利权，成立商会和商务部，保护商人和商业权益。可以说，以唐廷枢、徐润、郑观应为代表的香山买办，在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上的具体实践，以及在政治制度和外交政策等方面的理论探索，为近代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

香山买办文化在精神文化层面则具体表现为：生活方式的中西合璧、开拓创新；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取向上，崇洋而不媚外。买办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等方面的行为表现，在当时其实并不一定为人理解。事实上，他们常常受到传统鄙视和保守人们的抨击。他们虽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有的还捐了官衔，但仍然为社会所不齿。一度当过买办的容闳曾深有体会地说：“买办之俸虽优，然操业近卑鄙。……以买办之身份，不过洋行中奴隶之首领耳。”^②较开明的王韬也认为买办之称仅美其名而已，“实则服役也”。^③改良主义思想家冯桂芬也认为“今之习

① 参阅易惠莉：《郑观应评传》；夏东元：《郑观应》，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王杰、邓开颂主编：《纪念郑观应诞辰160周年学术讨论会文集》，澳门历史学会、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协会2003年编印。

② 容闳著，石霓译注：《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百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

③ 谢无量：《王韬——清末变法论之首创者及中国报道文学之先驱者》，《哲学研究》1958年第3期。

于夷务者曰通事，其人率皆市井佻达游闲……其质鲁，其识浅，其心术又鄙，声色货利之外，不知其他。”^① 依靠买办创办近代新式工商企业的李鸿章，早期对买办的评价也不高，他说：“其人不外两种，一、广东、宁波商伙子弟佻达游闲，别无转移执事之路者，辄以学习通事为逋逃藪；一、英汉等国设立义学，招本地贫苦童稚，与以衣食而教肆之。市儿材竖，来历难知，无不染洋泾习气，亦无不传习彼教。此两种人者，类皆资性蠢愚，心术卑鄙，货利声色之外不知其他。且其仅通洋语者十之八九，兼识洋字者十之一二。所识洋字，亦不过货名价目，与俚浅文理。”这些人“获利最厚”，而“无所忌惮”。^②



徐润的父亲徐宝廷及其遗训

有的学者认为：“在条约制度下培植起来的买办，是在中国文化土壤上长大，又经过外国资本家的训练发展业务，随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和半封建相伴的性质深入，使买办形成了多种层面的价值观念。有的观念甚至是彼此对立的。他们既追求西化，又力图适合中国传统文化，既渴求暴发，又企及声名褒扬，光宗耀祖；对外国资本家既忠心耿耿，又存有戒心。对于总体价值，最终寻找到‘中体西用’的公式。求得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与买办个人思想行为之间的协调，以及在中国社会文化传统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念冲突中找到一种平衡。这事实上是虚假的关系，表现了一种折中调和的倾向。”^③

与大多数买办崇洋媚外、奴性十足不同的是，以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

①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卷下，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7—38页。

② 李鸿章：《请设外国语言文学字馆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第11页。

③ 李燕编著：《买办文化》，第100页。